

清代军工,且看胡同里的“京旗五匠”

□ 程立平

胡同京味儿

清代以武立国,尤为重视兵械制造。自康熙至乾隆年间,逐渐形成被称为“京旗五匠”的军工生产体系。

所谓“京旗”,指清初驻防于北京内城(皇城以外)八个区域的八旗军队及眷属,即“京八旗”;“五匠”则指各旗清军中设置的专职制造军械的五类工匠,分别为弓匠、铁匠、鞍匠、盔匠和铜匠。这些匠人被集中安置于指定的胡同或营房,形成分工明确、协作生产的军工聚落(相当于现代兵工厂),实为清代前中期核心的军工制造体系之一。

至今,北京仍存许多诸如“铁匠营”“弓匠胡同”“鞍匠营”之类的地名,正是当年“京旗五匠”劳作之所的历史遗存——在这些胡同里,“京旗五匠”们挥舞铁锤的铿锵声曾日夜不息,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军工史。

精湛技艺铸就国家“军刃”

作为清军精锐八旗军队的直属军工系统,“京旗五匠”所生产的武器装备质量直接关系着大清的军力水平。因而,朝廷高度重视,制定了十分严格、细致的管理制度,指定由内务府造办处或兵部直接管理。皇帝也时常亲自过问指示,颁发明令谕旨。

“京旗五匠”的职责分工十分明确:弓匠专事制弓造箭;铁匠负责火炮、鸟枪、刀剑等铁制兵器;鞍匠精制马具;盔匠专攻盔甲;铜匠则主铸火炮、铳械零件及礼器礼仪器具。对五匠人员编制的数目甚至细致到个位。如雍正八年(1730年)《钦定大清会典则例》所载,京旗五匠编制为:弓匠1118名、铁



图①:清代兵器作坊。(AI制图)

图②③④:“铁匠营”胡同。(作者供图)

匠1113名、鞍匠447名、盔匠222名、铜匠23名。匠人来源可分为“旗匠”“汉匠”与“南匠”。清初沿袭明世袭匠户制,康熙后逐步推行雇募制,尤其对汉匠与南匠支付“工价银”招揽入役,这一市场化改革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。

兵器制作工艺极为繁复,技术要求极高。譬如制作弓箭需要精通木材处理、筋角胶合等复合工艺;制作马鞍需掌握木工、皮革雕花与金属镶嵌技艺;盔甲制作则需精通金属锻造与防护设计技术,一件成品往往历经百道工序。所以,对“五匠”的技艺考核十分严格。雍正八年,雍正曾亲颁谕旨:“此等匠役均系出征行围所需之人”,明确指出五匠的身份是服务于国家军事需求的匠人。朝廷还对五匠的工作技艺制定了严苛的考核和奖惩制度:命五匠“定期考验,其技艺不精者勒限学习”。如学习后考核还未达标“不能者鞭七十,革退”。从这道严旨可见清廷对五匠生产技艺的重视。

“京旗五匠”体系在清初有效保障

了兵器的规模量产与质量稳定,代表了当时中国军工技术的顶尖水平,在康熙年间多场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胡同地名留有军工印记

尽管“京旗五匠”代表了清代前中期军工生产的成熟形态,但它的技术基础是手工业而非机器工业,是劳动密集型的作坊式生产,仍局限于冷兵器时代。至19世纪,面对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坚船利炮,这一体系军事价值骤降,逐渐衰落关停,原有匠营大都转为民居,形成一批留有军工记忆的胡同地名。

北京以“铁匠营”为名的胡同众多,仅在丰台区境内就有6个,它们分别是:铁匠营、东铁匠营、西铁匠营、南铁匠营、北铁匠营和小铁匠营,成了铁匠营的扎堆之地,其中东铁匠营面积最大,现为繁华商圈,光彩体育馆、同仁堂药厂均坐落于此。西铁匠营转型为特菜基地。西城区厂桥附近也有“铁匠胡同”,原为正黄旗兵器营,1911年后

拆分为前铁匠胡同和后铁匠胡同。

以弓匠和“弓匠营”命名的胡同也不乏其例:西城区福绥境一带有东弓匠胡同、西弓匠胡同与小弓匠胡同;东城区北小街附近曾有南弓匠营与北弓匠营胡同,多源于乾隆年间弓箭作坊聚集区,如今大多因城市发展而变迁或消失。

鞍匠胡同位于西城区福绥境地区,原为内务府造办处辖下鞍匠作坊,称鞍匠营。民国时改称鞍匠胡同,该胡同现已不存。相传鞍匠营曾有王姓匠人因献“铁鎔(jiǎn)金镂雕双龙鞍”于乾隆,获封“九品鞍匠”,成为行业传奇。铜匠因涉及火炮铸造,技术保密性强,编制仅23人,作坊设于紫禁城内务府造办处,故城内未有相关营地遗存。

这些与“京旗五匠”相关的地名,不仅映射出清代军工生产的地理布局,兴衰演变,成为追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,也成为北京城市历史变迁中一道深刻的文化印记。

(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)

苏轼“盘”过的非遗瓷器

□ 赵文新

非遗文化之窗

北宋苏轼在64年的人生中,辗转游历30多个州县,也勾画了他的诗词版图。诗篇中描写的瓷器等物品,环绕着人间烟火,如今有些技艺入选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。

苏轼任杭州通判时,作于熙宁五年(1072)的咏茶诗《试院煎茶》,提到定州花瓷。“又不见今时潞(lù)公煎茶学西蜀,定州花瓷琢红玉。”写的是又不见如今的潞公(指文彦博,北宋名臣,封潞国公),效仿西蜀的方式煎茶,用定州产的花瓷泡茶,茶汤颜色红彤如玉。这两句诗具有画面感,定窑产的光滑的白釉瓷器盛放红玛瑙一样的茶汤,像丹青画卷,如婉转小令,可观可啜,凸显宋代煎茶文化的丰富内涵。

“琢削为酒杯,规摹定州瓷”,这是苏轼在颍州作太守,于元祐六年(1091)所写《独酌试药玉滑盏,有怀诸君子》中的诗句。写的是“药玉滑盏”以铅和白

石烧炼制成的酒杯,其样式和规格是模仿定州瓷制作的。从中可知定窑瓷器在当时成为器物制作效仿的典范,再次折射出苏轼对定窑瓷器的认可与推崇。

苏轼没有到定州上任时,就曾多次写了定窑。在宋哲宗元祐八年(1093),他被贬为定州知州,任职的8个月中,对于定州瓷器提及很多,写得很深情。他写的《寄馏合刷瓶与子由》诗:“小甑(zèng)短瓶良具足,稚儿娇女共燔(fán)煨(wēi)”。题目及诗中“馏合刷瓶”“小甑短瓶”,都是盛器,意思是炊具都已准备齐全,孩子们一起在火边蒸煮食物。苏轼将精心挑选的定瓷,寄给在京城汴京任职的弟弟苏辙(子由),描绘了想象中弟弟家中的画面,流淌着浓郁的温情。馏合、刷瓶是当时定瓷新品,苏轼寄出瓷器,手足情在千里传递中至臻至纯。

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记载:“真玉须定州磁芒不能伤者,乃是云。”“磁”为“瓷”,意思是真正的玉,即使是定州瓷的锋芒也不能损伤它。把玉与定州瓷器做比,可见定瓷在苏轼心中的分量。

定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,宋代六大窑系之一。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,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,故名定窑。定窑,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,始于唐,为邢窑的后继者,在五代时期就很发达。而今定窑遗址绵延10多平方千米,共有大型瓷片文化堆13座。于1988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08年定瓷传统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,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苏轼写北方定窑,也写南方建窑。地域不同、瓷器颜色深浅各异,他对它们的喜爱却是相同的。

作于元丰四年(1081)的《水调歌头·桃花茶》,是苏轼谪居黄州所作。“老龙团、真凤髓,点将来,兔毫盏里,霎时滋味舌头回。”词中的“兔毫盏”,也是宋代流行的茶具,产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后井村一带,所产的黑釉瓷盏俗称“建盏”。建盏中以漆黑发亮的乌金釉和变幻莫测的兔毫釉(壁有细密如兔毛的条纹)为代表,尤以兔毫釉更具盛名,故又

称“兔毫盏”。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于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这首词中,通过对名茶、名器的描写,细致传神地展现了品茶时的独特感受,从而窥见苏轼达观通透的人生态度。

“不独‘千山动鳞甲,万谷酣笙钟’,辟南荒之诗境也。”清末民初时期的学者王国宪在《重修儋县志叙》中这样评价苏轼在儋州的功绩。意思是不仅让自然万物都仿佛受到感染而生动起来,更重要的是,开辟了边远地区的诗歌文化境界。

其实,不仅仅在遥远的海南,苏轼在他或游历或贬谪的每一个地方,都用如椽的巨笔深掘生活的土壤,倾注饱满情感,洞察民生、民情、民俗,把所观所思凝成诗词作品中的意象。譬如瓷器,经过900多年时光的淘洗,愈发闪烁光芒,其中所蕴含的制瓷技艺已成为当今的非遗项目。

(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